



配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积极组织读、说、讲新书活动

长春市图书馆流通辅导部 鄒世魁

榆樹县五棵樹公社長新大隊圖書室，在黨支部和俱樂部管理委員會的領導下，積極貫徹圖書工作為政治、為生產、為社員服務的方針。緊密配合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向廣大社員，特別是向知識青年，宣傳和推薦現代優秀文學作品。根據社員的自願、需要和可能，組織了圖書活動，在群眾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一、以團組織為核心，建立圖書流通網 在開展圖書活動組織上，他們採取了以大隊共青團組織為圖書活動核心，建立了圖書流通網。他們實行了既有分片包干責任制，又有定期圖書串換制。一名書記負責一至五隊，一名書記負責六至九隊的圖書流通，這樣就使全大隊九個生產隊都建立了圖書流通點，構成了圖書流通網。為了擴大圖書流通率並避免社員總看一樣的书，採取了定期串換的辦法，來滿足廣大社員的讀書要求。每個生產隊里都有一名業餘圖書管理員，負責社員的借、還圖書工作，這樣就實現了“層層有流通圖書，隊隊有人管理圖書”。

二、配合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積極宣傳閱讀優秀圖書 長新大隊圖書室，圍繞着黨提出的向農村廣大社員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精神，針對農村看舊書、說舊書和講舊書的情況，採取了向廣大社員積極宣傳推薦《紅岩》、《王若飛在獄中》、《紅旗譜》、《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和《創業史》等三十五本優秀圖書，引導知識青年和廣大社員讀新書、說新書和講新書的興趣。為社員們輸送社會主義新文化，與反動的落後的舊書奪取宣傳陣地。他們所以能夠取得一定的成績，主要

是由于：**一、重視培養讀書骨干** 大隊黨支部，經常注意讀書骨干的思想教育。在開展階級教育、學習政策和向雷鋒同志學習等四次宣傳活動時，都能安排讀書骨干前去參加，使他們不斷受到思想教育和了解黨的中心，便於開展活動。此外，還在日常生活中關心他們的思想變化並及時地給予教育。其次，共青團兩名書記在借閱圖書上，總是注意和關心他們讀書的要求。比如：圖書室把新來的書，優先借給讀書骨干。這些讀書骨干讀過以後，就在群眾中談論這些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情節，這樣，就吸引廣大社員爭先恐後來借閱新書。**二、以新代旧，擴大陣地** 幾年來，大隊圖書室在社員們當中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是，由於現代革命文學在农村流通的不夠，品種不多，以及在社員當中有看舊書和說舊書的習慣，這個大隊在過去以來說唱舊書活動逐漸增多起來了。全大隊五個自然屯就有二十幾伙說唱舊書的。有很多總不上會場的老年人也都來聽。他們說的書有：《十粒金丹》、《肉丘墓》、《五女興唐傳》、《濟公傳》、《大公義》、《包公案》等二十幾部。這些書有的是借的，還有的是化“高價”錢買的。大隊的黨、團組織經過反復研究，認為說舊書會使封建迷信思想占領農村思想陣地，只有廣泛宣傳新書、才能使社會主義思想和文化在农村扎根。決心大力組織說講新書的活動。為了說好新書，大隊圖書室先為讀書骨干提供了一些故事性較強的好書。如：《林海雪原》、《平原槍聲》、《烈火金鋼》、《鐵道游擊隊》等新書，其次是通過講故事的形式來启发、培養社員聽新書的趣味和習慣。如二隊讀書骨干孔祥禮同志，是先

從給群眾說《林海雪原》一書的楊子榮舌戰小爐匠，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以後他又讲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由於他做好了準備，說的有聲有色，社員群眾也就很受聽，老年聽書“迷”馬振邦就問：“有沒有這樣的書呢？”由於群眾愛聽，他就從頭到尾說了《林海雪原》一書，社員都是段段听的津津有味。共青團支部就抓住了這個環節，在去冬春節期間，培養了一批說唱新書的積極分子。他們利用春節期間曾到過五個大院給社員們說過：《野火春風鬥古城》、《紅岩》、《林海雪原》等五本書，從此以後，他們利用晚飯後、地頭休息和下雨天給社員說新書。僅七隊社員宋明遠就給群眾說過《迎春花》、《紅旗譜》、《多浪河邊》和《朝陽花》等二十本書。此外，這個隊還有七名社員也經常給群眾說過新書，頗受社員好評。在第一生產隊社員里都知道臧瑞書能說《林海雪原》，在夏鋤地時沒有等他鋤到頭，就有社員來接上他，有的社員還把烟給他卷好，等着他說書。這不但培養了廣大社員喜愛革命文學的興趣，同時也提高了廣大社員的階級覺悟。有的年老社員反映說：“革命小說不比三俠劍差，楊子榮不次於勝英。”這充分證明革命文學作品在农村擴大陣地的影響和作用。**三、重點流通，普遍照顧** 由於大隊圖書室只有圖書一千三百多冊（其中包括從市、縣圖書館借的書和一部分連環畫在內），按現有圖書來滿足所有看書的社員要求是辦不到的，怎麼辦呢？兩位圖書書記就按自己分片包干的生產隊採取了重點流通，普遍照顧的辦法。馬振清同志就確定了二、三隊為重點圖書流通隊，李海清同志確定了

八、九队为重点图书流通队。为这几个队做到了优先供应一些新书和多借一些册数。并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能在两个月以内来大队图书室还一次图书。各队的社员可以利用每天休息时间去图书室那里借到自己喜爱的书。这样新书在全大队就得到了经常流通。仅以第二生产队为例，他们全部劳动力是六十一名，而看书的人数就有四十九名，占全队劳动力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周志平社员已看过三十多本了。

正由于革命文学扩大了活动阵地，对提高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劳动热情确实起了积极作用。如：五队共青团员陈祥，他是担任队里的保管员，由于他过去存在怕得罪人，嫌麻烦的思想，就不愿意干。而他看过《红岩》一书后，思想有了转变，他说：“书中的许云峰，江姐和成岗等革命先辈，为了革命都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当个保管员还是怕前怕后的，这就太不对啦！今后我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从此以后，他就把队里的一切物品都管理有条不紊。社员群众都称赞他说：“陈祥真行！把队里的各种物品都管理的象商品陈列一样了！”社

员周志平看了《太行风云》一书后，他就连系到队里的生产问题，主动找党组织谈他们队里丢失粮食的情况，使问题得到解决。青年社员穆清，过去干活不够踏实，通过书中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感染与教育，有很大转变。在春耕前锄草时，别的社员嫌脏，他就能主动去干，挂锄时，队里有修拉林河的民工任务，他也能积极去参加修河堤。二、三队的妇女队长顾喜珍和孔淑华，过去总是怕得罪人，不愿负责。当她俩看过《女共产党员》、《我的一家》和《革命母亲夏娘娘》等书后，思想就有了转变，她们决心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品质，在参加夏锄和秋收生产中，妇女发挥了很大作用，妇女反映说：“我们的队长管事了。”

长新大队开展读、讲新书的活动的经验证明：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都喜爱革命文学作品。只要我们的组织工作跟得上，方法对头，大力开展读新书、看新书、读革命故事等活动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长新大队的图书活动的经验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有这些，都是使这些书目检索工具不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作用的原因。

书目、索引、文摘、快报等书目检索工具与其它类型的工具书（如百科全书、年鉴、手册等）一样，有其特点。读者借阅这些出版物往往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翻检查找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料的线索。因此，借阅手续越简便越好。怎样才能适应这个特点呢？我认为下述几种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一）开辟专门阅览室。把本馆收藏的各种书目、索引、文摘、快报等书目检索工具集中在这个阅览室内，并采取开架的方式供读者翻阅利用。例如北京图书馆的“科技文摘索引参考室”就是这样做的。（详见本刊本期另文）。这些书目检索工具集中以后，不仅方便读者利用，对于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也很方便的，并且还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复本，节约购书经费。

（二）加强书目检索工具使用方法的宣传和辅导工作。书目检索工具的种类繁多，编排体例各异，有些读者对其感到生疏，或不善于利用。图书馆工作者，特别是做参考书目工作的人员，有责任向读者进行有关书目检索工具使用方法的宣传和介绍，帮助他们掌握运用这些工具的方法。近年来，很多图书馆先后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与该校社会科学处、图书馆学系联合举办的“文科工具书讲座”（详见“图书馆”1963年第3期第64页）；吉林医科大学图书馆利用读者来图书馆委托代查书刊资料时，趁机向读者介绍这些书目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等（详见“图书馆”1962年第1期第11页）很受欢迎。此外，如编印书目检索工具使用法的宣传资料。编印“读者手册”、“工具书使用法”等宣传介绍性的资料，对于读者也很需要。

总之，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充分发挥书目检索工具的作用，是图书馆做好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应抓紧的一环。

充分发挥书目检索工具的作用

振 西

全国各地所有肩负着为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服务的图书馆，为了满足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需要，除了自己编印各种新书通报、专题书目、联合书目和各种专题文献索引外，对于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书目、索引、文摘、快报等书目检索工具的搜集与补充。都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很多图书馆都把这些书的补充入藏，列为本馆采购工作的重点之一，给与优先保证。这些书目检索工具的收藏量在很多图书馆内并不在少数。但是，由于整理的不及时，或管理使用的不尽妥当。使它们不能与迫切需要利用的读者见面，因而大大地降低了它们的使用率。

例如：有的图书馆把入藏的书目、索引、文摘、快报等书目检索工具，放在办公室内，只借工作人员参考使用；有的由于书刊分界标准的更动和其他原因，把一部完整的具有连续性的书目检索工具分散放在好几处，使读者借阅时跑来跑去；更多的图书馆则是不从这些书目检索工具的特点出发，而把它们与一般图书同等看待，同样地进行分类、编目、入库保管，当读者需要利用时，必须履行查目录，写借书条，等候取书等等一系列手续，才能借到；此外，还有一些图书馆很少向读者进行书目检索工具的宣传介绍，和辅导读者掌握利用它们的工作。所

灵活运用著者号,提高分編质量

安徽省哲学研究所 蔣 完 奎

图书分編工作是图书馆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图书分編不好,犹如军队組織不好一样,沒有很好組織的军队,就不能发挥战斗的威力,图书分編质量不高,就不能发挥图书的作用,道理是很显然的。作为一个图书分类員,对于每天“候編”的大批图书,正需要具有高度的組織能力,根据它們的特性、作用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把它們分別編到各个有关类目中去,使图书能充分为讀者所利用,这就是分类員的光荣使命。

分类員的武器,就是图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碼表。一般分类工作人員,对于分类法的重視自不待言,因为分类法首先起着决定图书組織的規模和体系的作用:分类法有十七大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图书就被分为十七大部分;分类法有二十六大类(如《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图书就被分为二十六大部分。但是著者号的作用,却不是每个分类員都給予了应有的重視,甚至表现在某些分类法本身,由于著者号采取顺序号(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就更限制了著者号的作用,它只能成为同一类目下面的区分符号了!

实际上,著者号的作用远远不止如此。为了說明問題,下面将以《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科院法》)和它所采取的著者号碼表为例,談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們认为著者号的任务,不仅是同一分类号的区分者,而且还是专题資料的集中者。例如《科院法》規定,傳記一律以被傳人姓氏为著者号,就是运用著者号集中专题資料的典型范例。我們知道,为了紀念魯迅,学习魯迅,有很多人写了魯迅的傳記,假使我們將許广平、王士菁、平心等等許多同志写的魯迅傳記文章,分別以原著者姓氏为著者号,那末就出現了“517”(許)“126”(王)“158”

(平)这些不同的号碼,这些号碼又势必为各自相近的号碼所隔离。如果我們以被傳人(魯迅)姓氏为著者号,那末就可以在“779”(魯)这个号碼內收魯迅的傳記資料集中了(当然“779”后面还要加区分号)。

是不是被傳人都必須千篇一律地用作著者号呢?我认为也不尽然,对有專門类号的被傳人,就不宜套用。

被傳人有專門类号者,本文写的著作,不用本人著者号,可用“01”、“02”、“03”顺序号,这样可以使被傳人本人的著作,集中在該类的前面,后面再跟其它写傳人或評介性著作。一看眉目分清,不致混杂。例如:《科院法》哲学类內康德有专类“15、1845”,假使康德的著作,我們用康德的作者号“524”,那末,齐良驥写的(著者号“197”)和戴博林写的(著者号为“522”)有关評介康德的著作,只能一前一后被康德自己写的著作分开了。这样就不能將原著突出集中在前,而且用“01”,“02”,“03”,代替“524”,“524—2”,“524—3”,著者号也簡單的多。分类号“151845”已經代表了康德,“524”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524”仅表示“康”字)。

哲学类也是同样情况,假使把孔子的傳記都以被傳人姓氏著者号,那末孔子“13,123”这个类目下的著者号,也只能都是“142”(孔)后面再拖上一条“长尾巴”(区分号),这有什么意义呢?岂不是形成“画蛇添足”了嗎?

由此可見我們不仅要善于运用著者号集中,还要善于运用它分散。但是著者号的运用,决不是分类員的主观臆測,更不可能由分类員任意安排。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图书分編工作者,首先思想上要明确,图书分編的任务是要使图书经过分編,科学地有条不紊地出現在讀者面前,所謂科学,就是要根据客观法則和实际效果;有条不紊就是同一內容的图书,

要求不被打乱。分編工作的灵活性,就表现在:不是教条式套用分类法的規定,而是时刻从分編的实际效果出发,如果違反了这个原則,“灵活性”就变成“自由主义”了。

同样的道理,也应用在其它方面。再举一例:对于多卷集而又不是一個編著者自始至終編著的图书,它的著者号就必须根据第一卷(册、集或輯)的著者号确定,否則一套分期出版的多卷集图书,就不能集中在一起了。如北京“三联”出版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主編是弗兰采夫,第二卷主編是烏特欽科,第三卷主編是西多罗夫,第一卷主編弗兰采夫的著者号是“165”,第二卷和第三卷到館时,也只能用“165”为著者号,这样才能使这部书不被分散、如果我們第二卷用“487”、(烏特欽科的著者号)第三卷用“207”(西多罗夫的著者号)为著者号,那末不仅在同类号中收有很多“插队”者,即使在没有其它著者号“插队”的情况下,它們三者本身的排列次序也已經乱了(一卷在前,三卷在中,二卷在后)。再如《十万个为什么》(上海“少儿”出版),截至目前为止,已陸續出版了七个分册,还将繼續出版。它是由不同的編著者分別輯成的一套通俗科学小类书。如果我們按照各个分册的編著者来取著者号,那末也势必將这套书分散各处。虽然类号相同約束了它的“越界”能力,但終究不免使同类号的一套图书排列得凌乱不堪。

但是对于已打散分入专类或殘存的多卷集,就沒有必要一定也套用前法,例子很多,这里也不一一細举了。

其次,我还想談一下著者号在特殊情况下还可采取特殊措施,不局限于按編著者姓氏上取号。例如《科院法》馬克思列宁主义类,对于各經典作家的个别著作和专题匯編是放在同一类号內的,馬克思的是02.3,恩格斯的是03.3,列宁的是04.3,斯大林的是05.3,毛澤东的是06.3。經典作家們的个别著作又是那末多,如果我們这种情况仍沿用著者本人著者号,那末在毛主席的个别著作和专题匯編类

(06.3), 就将产生许多“149”(毛澤东的著者号)后面再附一連串的分号。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专题汇编的图书的著者或前或后地分不清, 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編的《毛澤东同志論教育工作》一书的著者号“106”和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編的《毛澤东同志論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书的著者号“189”, 就将排列在“149”的一前一后, 这仅仅是两本书的例子而已。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經典作家的个别著作, 最好是改用年代号为著者号, 如毛主席著作《論人民民主专政》为“49.6”(一九四九年六月发表的), 《實踐論》为“37.7”(一九三七年七月发表的), 《矛盾論》为“37.8”(一九三七年八月发表的)。这样不仅克服了个别著作与专题汇编分不清(因为前者是两位数字加小数点, 后者是三位数字)和个别著作著者号重复的缺点, 而且还使个别著作本身的排列, 也有了年代的順序, 便于讀者查找。

这里必須附带說明两个問題:

1. 年代号取两位, 例如“50”, 究竟是1850还是1950呢? 我考察了一下經典作家的著作年代, 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都是十九世紀; 斯大林、毛澤东的著作, 都是二十世紀, 只有列宁的著作是跨了十九和二十两个世紀(即自1893年至1923年)。因此, 也只有在列宁的个别著作04.3这一类內产生这个疑問。我們只需記住五十年代(即“50”)以后的数字, 都肯定是十九世紀(加18); 五十年代以前的数字, 都必然是二十世紀(加19)。

2. 同年同月发表的两篇以上的著作怎么办呢? 我的主張采用順序号。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經典作家中有一个月內发表过10篇以上著作的。所以順序号用一位也就够了。如果采用日期来区分, 那末一个月中10—31号占了 $\frac{2}{3}$ 的可能性, 就必须用两位数字, 何况有些著作正确的日期还很难考。

此外, 著者号灵活运用地方还很多, 例如对于會議文献, 可采取會議名称或届次为著者号(會議日期也可); 对于专书評介和研究, 可采取书名首字为著者号; 对于地方文献, 可采取地名首字为著者号; 等等。总之, 为了提高分編工作的质量, 讓我們給著者号以应有的重視吧!

最后, 我簡單解釋一下著者号与著者目录的关系, 該不是多余的事。因为曾經有人提出过:“这样灵活运用著者号, 岂不是查不到原著者了嗎?”

我們大部分业务較熟悉的同志, 也都能回答这个問題: 灵活运用著者号, 并不等于任意篡改原著者, 原著者在著者目录中还是應該充分反映的。許广平、王士菁和平心等同志著的魯迅傳記, 在著者目录中仍能查出他們的名字和所著的书名, 并不因著者号改取了魯迅的姓氏, 而有所改变。著者号和分类号是索书的工具, 当然这是指对讀者和书库管理員(出納員)而言; 对于分編人員來說, 那就正如本文所指的, 它們就成为組織图书、使图书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的有力武器了。

行經常的檢查工作。我們把目录保养工作納入整个图书馆目录的日常工作中, 并設专人专职負責檢查破損程度, 及时更替新片。三、注意目录組織。适当的增加指导卡、互見卡、參見卡, 不仅可以提高讀者查找目录的速度; 而且适当的指导卡亦可以防止卡片晃動过大而产生卷折現象。对于分类目录的各类类名、类号和字顺目录的单字都詳細、明显的写在抽屜外面的标签上, 讀者也就可以直接选取他們所需的目录卡片。四、調整各个目录抽屜的卡片疏密程度。目录卡片排得过密, 不便翻閱, 目录卡片排得过疏, 使用时来回晃動亦容易損坏卡片。五、改进目录抽屜的設備。目录抽屜不能太寬或太窄, 其寬度必須与卡片相同。每一个抽屜的卡片后面應該設一铁档板或木档板, 以伸縮卡片的疏密, 使卡片保持一定角度。在档板之前, 卡片之后再加上大小与目录卡片相等的硬紙板, 以保护卡片。此外, 通条不要弯曲。在目录抽屜中通条是个軸心, 如果軸心不正, 卡片也就起伏不平, 容易使穿洞口破烂。六、著录时注意书号的位置。书号是排架的依据, 书号模糊不清, 直接影响图书流通、借閱。因此, 編目員在著录时应注意书号的位置, 不要太往左上角, 最好与书名平列。书号长的还可以比书名低, 往著者項移行的地方。七、設置备用卡片。这是目录保养工作的一个重要措施。現在我們对每种新出版图书都向中文图书卡片統一編目組訂购二十四張鉛印卡片。除了公务排架目录、公务名目录和分类、书名、著者三套讀者目录用卡以外, 我們把剩余的全部卡片, 按統一編目的排印号排列起来, 作为备用卡片。至于自己分編的油印卡片則由自己編号, 按各年代的印刷号排列。如果某一目录卡片已破損时, 就按該卡片的排印号或印刷号在备用卡片里找出, 以新更旧, 重新排入讀者目录中。有些卡片破損特別大, 二十四張鉛印卡片全部用完时, 可由自己用油印翻印, 按原排印号, 重作备用卡片。

怎样做好目录保养工作

北京图书馆 黄俊貴

图书馆目录是揭示藏书、宣傳图书、輔導閱讀的工具。要使图书馆目录發揮其应有的作用, 除了正确組織目录, 对讀者加强目录宣傳、指导外, 还必须經常不断地做好目录保养工作。所謂目录保养工作是指对目录卡片的保养, 防止因破損而丢失, 及时更新破旧卡片, 保证目录的完整性。目录保养和目录組織、目录宣傳

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怎样加强对目录的保养工作呢? 根据我們的具体情况, 采取了如下几項措施:

一、加强目录使用方法的宣傳工作。在目录室設各种目录的抽屜号檢索表, 張貼簡化汉字表、分类表基本大类表和目录使用方法說明, 并口头向讀者进行爱护目录的宣傳。二、进